学术专论

达里冈爱归属变迁详考

张临希

[摘要] 达里冈爱地域辽阔，由喀尔喀蒙古献给康熙帝，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被建成为皇家最大牧厂。它隶属于内务府并由察哈尔都统兼管，但地处漠北不易控制。1912 年逊清内务府催逼献羊又不付年薪，迫使该地官员在 8 月北投外蒙古库伦当局。民国察哈尔都统出兵收复失败，库伦当局遂占有此地，将总管制改为世袭扎萨克制，以求战备资源。1915 年“中俄蒙谈判”期间，库伦当局以实际管辖为主张，北京政府以属地、属人原则相驳，用漠北台站所有权换回达里冈爱。袁世凯 9 月招抚该地扎萨克进京受封并将其滞留，11 月恢复总管制。随后北京政府赈灾、筹办国民学校，并在民国地图上将之画入察哈尔。1921 年外蒙古再度失控，达里冈爱随即又一次外附，回到康熙朝之前的归属，终成民国第三大失地。

[关键词] 辛亥革命　内务府　外蒙古　北京政府　边疆治理

[**中图分类号**] K25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8587（2025）– 05 – 0160 – 015

中国北部边疆各地沿革大多清晰，唯有夹在内、外蒙古①之间的达里冈爱地区，②其归属变化的诱因、过程均无定论。此地面积约3.1万平方公里，③曾是清朝皇家最大牧厂，④原本归属清晰，⑤却由于逊清内务府举措失当而投入外蒙古，成为发端于民国时段的面积第三大失地。⑥ 民初十年

[收稿日期] 2024–04–29

[作者简介] 张临希（1977—　），文化和旅游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80，zhanglinxi@pku.edu.cn

① 本文按嘉庆《大清会典》规定以漠南、漠北地区定义内、外蒙古。

② 在历史文献中“达里冈爱”常见“里”写作“哩”，“冈”写作“岗、刚、甘”，“爱”写作“崖、阿、嘎、叆”等，本文除引文外统一作“达里冈爱”。

③《蒙古志》记载此地“广三百里，袤四百里”（姚明辉：《蒙古志》卷 3，光绪三十三年刊本），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显示其形似椭圆，清代“一里”合 576 米，椭圆面积 S=π × 长轴长 × 短轴长 ÷4≈3.1 万平方公里。李毓澍记达里冈爱面积二万三千多平方公里，或许是将“一里”合为民国统一长度后的 500 米计算。

④ 哈斯巴根认为满语、蒙语“苏鲁克”应规范译为“牧厂”而非“牧场”。本文遵照此规范，清代建立的牧场统一作“牧厂”，民国建立的“明安牧场”“模仿牧场”遵照民国名称作“牧场”。参见哈斯巴根：《清代口外王公牧厂探赜》，《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 期。

⑤ 苏德毕力格、陈肖寒对达里冈爱牧厂的设立时间、官员组成和管理制度有所探讨。详见苏德毕力格：《清代察哈尔官牧群考述——以上都达布逊诺尔牧群为中心》，《内蒙古社会科学》2022 年第 5 期；陈肖寒：《七重奏：清朝统治治理口外之艺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年，第 21、72–79 页。

⑥ 民国面积前二的失地是唐努乌梁海、科布多，而外蒙古喀尔喀四部脱离发端于宣统三年，未到民国时段。

间，围绕达里冈爱的博弈勾连起逊清内务府、北京政府、察哈尔地方、俄国政府与外蒙古库伦地方政府。之前因为缺乏史料，具体争夺过程无人知晓，学界仅能通过旁证推测时间点：李毓澍推测该地在1919年之后才归入外蒙古；[①] 周学军推测该地在1912年初已归入外蒙古。[②]

笔者搜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中研院"等处所藏档案史料，发现这上述互相矛盾的结论都有部分合理性，因为学者们各自根据旁证推断出局部事实，但又都不准确，不知其间事有重大反复。本文将此间内务府的失当、北京政府的补救、反复的前因后果一一呈现。达里冈爱地域位置详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全图（二）》及华林甫主编《清史地图集：全国图（一、二、三、四）》。[③]

一、皇家牧厂的管辖变迁

漠南、漠北蒙古之间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明清时期称为"瀚海"，唯有夹在漠南锡林郭勒盟与漠北车臣、土谢图两汗部之间的达里冈爱水草丰美。《万山纲目》记载"大漠东至此而尽"，[④]《口北三厅志》记载该地羊群"在瀚海迤北地方驻牧"，[⑤] 可知此地迥异于戈壁，对游牧十分重要。达里冈爱与漠南相接处多为沙漠，[⑥] 与漠北相接处是连绵的草原，在地理上处于漠北。漠南、漠北间的张库官道（台站路）与张库商道主线，均不经此地，因此士人对它的记述极少，不易引起关注。

锡林郭勒盟大部分蒙旗在崇德、顺治年间编成，康熙四年（1665）阿巴哈纳尔部移至漠南，两年后被划定牧地，自此锡林郭勒盟游牧界线确定，在行政意义上，达里冈爱的南界（与漠南各旗界）形成。康熙三十年，多伦会盟后清朝正式统治漠北喀尔喀蒙古，其中车臣汗、土谢图汗共同将属地达里冈爱献给康熙。同年，土谢图汗部左翼中旗、车臣汗部左翼后旗设旗划界，于是达里冈爱的东、西两界（东、西与漠北各旗界）形成。根据《清史稿》说法，达里冈爱牧厂建于康熙九年，[⑦] 但此时是多伦会盟之前，喀尔喀尚未献地，且内务府在康熙三十七年设立口外各牧群总管，却在两年后才设立达里冈爱羊群翼长，说明在三十七年之前此地尚无皇家牧群。笔者认为，内务府在康熙三十九年才于此地建立牧群，并发展为皇家最大牧厂。[⑧] 乾隆十四年（1749），车臣汗部中末右旗设旗划界，达里冈爱的北界确定，由此它"地势三面与外蒙毗连"，[⑨] 只有南部与内蒙古相接，这也造成它日后更易被外蒙古控制。光绪三十三年（1907）成书的《蒙古志》将它与周边蒙旗的位置关系记录为：

> 东至衮鄂都尔与车臣汗左翼后旗为界，西至札木额古德都木达呼都克与苏尼特左翼旗为界，南至额钦碧流图与阿巴噶右翼旗为界，北至锡巴尔图鄂格什与车臣汗中末右旗为界。[⑩]

可知其始终与内、外扎萨克蒙旗分隔明确，未混入任何一方。1916年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显示，

---

① 李毓澍：《论内外蒙分界问题》，《蒙事论丛》，里仁书局，1990年，第346页。

② 周学军：《达里冈爱牧场被外蒙古占领时间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4期。

③ 《清时期全图（二）》，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册《清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5页；《全国图（一、二、三、四）》，华林甫主编：《清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23年，第9、13、15、19页。

④ 李诚：《万山纲目》卷2，光绪二十六年长沙刻本。

⑤ 金志章纂，黄可润增校，乌云格日勒点校，忒莫勒审定：《口北三厅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59页。

⑥ "自素呢特（注：苏尼特）至达里冈爱皆沙漠"，载《清诗汇》卷122《商都杂兴》，民国十八年退耕堂刻本。

⑦ "康熙九年……是时大凌河设牧厂一，边墙设厂二，曰商都达布逊诺尔，曰达里冈爱，隶上驷院。"赵尔巽等纂：《清史稿》卷147《兵制十二·马政》，民国十七年清史馆排印本。

⑧ 金海等编：《清代蒙古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9页。

⑨ 《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1914年10月20日，察哈尔都统何宗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馆藏号：03-32-164-02-036。

⑩ 姚明辉：《蒙古志》卷3。

车臣汗部“边界防队”巡逻时，扣留自达里冈爱越界的官员，[①] 证明此时达里冈爱与外蒙古依然存在分界。

达里冈爱的居民籍属混杂。此地原住有车臣、土谢图两汗部的喀尔喀人。康熙三十五年上谕令躲避噶尔丹进攻的喀尔喀台吉阿里雅阿尔萨兰卫寨桑、喀尔喀扎萨克车陵扎卜及属众安置在达里冈爱，于此地牧放马匹；雍正时期，朝廷又命阿巴噶、乌珠穆沁两千兵士携妻儿驻扎于此，雍正十二年（1734）换班为苏尼特兵士。[②] 之后一段时间内，锡林郭勒盟数旗轮流驻防此地。至此，达里冈爱已为漠南、漠北蒙古人杂处之地。但牧厂所有权早已转入皇家，不属于漠南、漠北地方，因此乾隆十五年车臣部属旗十三人在此盗马，皆被判为劫夺官马。[③]

皇家对达里冈爱管理的核心是牧政。内务府上驷院为管理口外马驼，在顺治初年建立上都、达布逊诺尔牧厂（两者似乎在乾隆时期合并）。[④] 喀尔喀献达里冈爱后，上驷院于康熙三十九年在此“设驼一群，牝、牡各五十只，是年移上都达布逊诺尔牝驼五群于达里冈爱牧放”。[⑤] 此三牧厂共设正四品总管一名，称“上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冈爱总管”，其下的达里冈爱设总司牧养协领（小总管）一名，翼长五名，下属马 60 群、驼 16 群，每群下设牧长、牧副、牧丁，不设护军。内务府庆丰司管理口外牛羊，先建有三旗牛羊群，后于康熙三十七年设察哈尔牛羊群总管一员，康熙三十九年“题准达里冈崖添设羊群翼长一员、笔帖式二员”，[⑥] 均归察哈尔牛羊群总管统领。据此可判断康熙三十九年，即 1700 年，是达里冈爱成为皇家牧厂的时间。

雍正初年此地羊额 10 万只，后因军需短暂裁撤、复建，至乾隆初年存羊 3 万只，后又历经孳生、均齐，至道光年间有羊 80 群约 9 万只。至光绪朝，达里冈爱已是口外各牧群中存羊最多的。[⑦] 因保护羊群需要，各群设骁骑校、护军校、护军等。以上各官丁俸饷，由内务府指令户部支给。[⑧] 可见达里冈爱为皇家直属，内务府、兵部、户部共同负责。对达里冈爱官员的奖惩制度也逐渐内地化，清中期朝廷规定该地盗案逾期未获，缉捕官照内地设有墩铺失事例，[⑨] 相应参降罚俸。

牧厂马驼牛羊为朝廷军需、祭祀与内廷供应所用，牲畜数量与草场配比得当才有利于孳生，因此内务府定期“查群、均齐”，以多移少，平均各牧厂牲畜数量。但内务府距各牧厂遥远，不便管理，乾隆二十七年于张家口设立的察哈尔都统，逐渐成为口外各牧厂的在地管理者。各牧长原为京中补放，随着察哈尔在地管理，凡有缺出，由“该牧长等员内拣选拟正、拟陪”，赴京引见至内务府决定是否录用，牧丁也由内务府管领下人转为八旗察哈尔蒙古人。官丁年薪原由总管赴京领取，清中期之后为了便利，每年内务府审核造册咨文户部，直接将年薪拨至张家口的口北道库，四、五月间由各牧长派人领取。光绪初年，达里冈爱公费支出也改由“张家口同知循旧经理”。[⑩] 光绪三十年，清廷体谅各牧长艰难，规定选任拟正、拟陪毋庸来京引见，只需察哈尔都统送上名单，再由皇帝朱笔圈出即可。[⑪]

---

① 《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1916 年 12 月，察哈尔都统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馆藏号：03–32–141–01–061。

② 《清圣祖实录》卷 176，康熙三十五年九月癸未；《清世宗实录》卷 144，雍正十二年六月戊午。

③ 《清高宗实录》卷 368，乾隆十五年七月甲辰。

④ 苏德毕力格：《清代察哈尔官牧群考述——以上都达布逊诺尔牧群为中心》，《内蒙古社会科学》2022 年第 5 期。

⑤ 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 166《内务府 · 上驷院》。

⑥ 雍正《大清会典》卷 232《内务府 · 庆丰司》。

⑦ 李鸿章：《覆陈察哈尔牧厂参案折》，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李文忠公奏稿》卷 66，民国金陵刻本。

⑧ 金志章纂，黄可润增校，乌云格日勒点校，忒莫勒审定：《口北三厅志》，第 159 页。

⑨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二》卷 490《兵部六十四 · 八旗处分例 · 捕盗》。

⑩ 李鸿章：《筹议三厅改缺事宜折》，光绪七年九月三十日，《李文忠公奏稿》卷 42。

⑪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二日，察哈尔都统溥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5973–013。

综上，达里冈爱自康熙朝多伦会盟始由漠北喀尔喀所有转为皇家所有后，一直保持有界性。通过察哈尔都统管理，查群、均齐等制度，它在资源、人员方面与口外各牧厂连为一个体系，纳入漠南一侧的内属蒙古管理，部分成为察哈尔的下属机构。清末民初达里冈爱主要官员履历，见表 1。

表 1　清末民初达里冈爱官员履历

牧群	名	出身	履历	升迁关键	升任
牛羊群	卓特巴扎普	察哈尔正白旗蒙古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护理察哈尔牛羊群总管关防，次年四月改为署理	宣统元年送孝钦显皇后奉安礼执事，恩诏加一级	察哈尔牛羊群总管
牛羊群	玛克苏尔札普	察哈尔正白旗蒙古	达里冈爱羊群笔帖式，当差 31 年	光绪十九年为直隶赈灾捐牛，二十九年为山东河工捐银	宣统三年三月任达里冈爱羊群翼领，1912 年逃往库伦
牛羊群—马驼群	依达木札普	察哈尔八旗蒙古	察哈尔牛羊群左翼副总管	1912 年马驼群原总管逃往库伦	1912 年 10 月任达里冈爱马驼群小总管
马驼群	布彦德勒格尔	察哈尔厢蓝旗蒙古	牧长当差 27 年，左翼驼群翼长在任 17 年	光绪二十七年报捐库款	光绪二十八年 48 岁，任达里冈爱马驼群总管，宣统元年因欺玩降职为翼长
马驼群	索诺木多普丹	察哈尔八旗蒙古	达里冈爱马驼群翼长	光绪三十二年国民捐，交马匹，宣统元年布彦德勒格尔被降职	达里冈爱马驼群小总管，1912 年逃往库伦

资料来源：《内务府来文》，宣统元年四月初八日，察哈尔都统成勋，档案号：05-13-002-000992-0050；《内务府来文》，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陆军部，档案号：05-13-002-001009-0123；《内务府呈稿》，宣统三年四月初四日，庆丰司，档案号：05-08-007-000174-0003；《内务府来文》，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四日，察哈尔都统奎顺，档案号：15-02-001-000205-0259；《内务府来文》，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五日，察哈尔都统溥颋，档案号：05-13-002-001762-0125；《宫中档》，宣统元年七月十一日，察哈尔都统成勋，档案号：04-01-30-0206-055。以上均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何宗莲呈大总统遴委依达木札普接署达里岗崖马驼群总管请鉴核》，1912 年 10 月 23 日，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第 1 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166 页。

由表 1 可知，清末民初达里冈爱官员及其上级总管，均为八旗察哈尔蒙古人，他们的升迁关键是捐纳和承担皇差。由于察哈尔都统统一管理口外各牧厂及牧群，官员可在马驼群与牛羊群之间流动，这些都促使达里冈爱转为察哈尔越过锡林郭勒盟以北的飞地。清朝终结后，根据《清帝退位诏书》，清朝所有地域均应归属中华民国，于是北京政府继承达里冈爱“向隶察哈尔都统”的传统，[①] 认定其为内属蒙古的一部分；根据《清室优待条件》，达里冈爱的马驼群、羊群产权归逊清内务府所有，各牧群护军归入陆军系统，但均沿袭由察哈尔都统在地管理的传统。如此，达里冈爱在民初成为新旧权力混杂的地带。

① 《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1915 年 1 月 15 日，外交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号：03-32-166-02-079。

二、欠饷、催羊与达里冈爱第一次被占

民国元年（1912），新旧政权交替带来混乱。达里冈爱年薪原由内务府通知户部（度支部）下发，但清帝退位后皇室用度受限，逊清内务府也无法指导新组建的财政部，一时间无人问津年薪究竟应出自内务府、陆军部还是察哈尔都统。按旧规，达里冈爱总年薪二万八千余两，应在阴历四、五月间领取，但民国肇建，事无头绪，领饷委员自阳历3月到张家口等待，哀求至9月，内务府的签领单仍为空白，[①] 至10月初察哈尔都统何宗莲无奈央求大总统“赶早发放，以安蒙心”。[②]

与此同时，逊清内务府因新旧政权交替，恐惧皇室旧产外流，加紧催逼达里冈爱交羊。按旧例，每年口外各牧厂需向内务府交羊二万八千只，分七次挑选到京入圈，供应皇室祀典与内廷膳品。宣统年间口外受灾，“羊只并无盈余”，[③] 自宣统元年（1909）以来各牧群累计欠交达17次。市面窘困，京城各圈无法垫办。内务府却不在乎牧业的可持续孳生，屡次逼迫达里冈爱“将齿过二岁上好肥羊拣选齐备”，[④] “护送来京以备承应内廷膳品等项需要”。[⑤] 其中以1912年6月催逼最为激烈，内务府严饬牧群人员“意存观望，延不备齐”，[⑥] 行将处罚，而此时达里冈爱翘首以盼的年薪却悬而未决。

另一方面，刚刚脱离清廷的外蒙古库伦地方政府（以下简称“库伦当局”）向蒙古各地送信，通报他们已驱逐清朝官员，声称“蒙古亦宜联合，自立为国”。[⑦] 达里冈爱牛羊群翼长玛克苏尔札普、马驼群总管索诺木多普丹既等不到北京的年薪，又凑不出逊清内务府反复催逼的羊只，将面临罚俸、停职等严厉处罚。他们手握外蒙古保证官爵的信件，不由得另做他想。1912年8月，玛克苏尔札普“不安本分，私自前往库伦”，[⑧] 因其精通满蒙文字，被库伦当局委任为“司法部”副长官。[⑨] 索诺木多普丹更带领牧户牲畜北迁，将1900—1912年间的案卷、文册、经纬图等全部献给哲布尊丹巴，使库伦当局掌握达里冈爱的户口、牲畜、地形、驻扎详情。他因“功劳卓著”，被封为世袭达里冈爱扎萨克辅国公，后又晋升为郡王。由此可见库伦当局改变了管理达里冈爱的办法，将此地流官体制改变为世袭扎萨克制。这一方面是对投奔者的奖励，另一方面也因库伦当局官僚体系捉襟见肘，还不具备用总管制直接管理的能力，为更方便获得马驼羊等战略资源，只能倒退回游牧封建下的世袭扎萨克体制。自此文献中常见“达里冈爱五旗”称谓，或因将马驼群五翼长称为五个旗，但仅由索诺木多普丹一位扎萨克管理。索诺木多普丹此后常驻库伦，不回牧厂。库伦当局急需达里冈爱丰饶的牧业，立即开设库伦至此的往来乌拉（运输队），令陶什陶带兵五百掠取牲畜。

---

① 《内务府呈稿》，1912年9月，总管内务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5-08-033-000010-0031。

② 《署察哈尔都统何宗莲呈大总统请迅饬财政部发达里岗崖马群羊群俸饷文并批》，1912年10月2日，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第1册，第152页。

③ 《内务府呈稿》，1912年9月，总管内务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5-08-033-000010-0029。

④ 《内务府呈稿》，1912年9月，总管内务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5-08-033-000010-0030。

⑤ 《内务府呈稿》，1913年1月，总管内务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5-08-033-000010-0043。

⑥ 《内务府呈稿》，1912年6月，总管内务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5-08-033-000010-0009。

⑦ 西盟王公招待处编，乌兰托娅点校：《西盟会议始末记》，忒莫勒等主编：《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北部边疆卷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5页。

⑧ 《内务府呈稿》，1912年8月，总管内务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5-08-033-000010-0026。

⑨ 牡丹编译：《卓特巴扎普传略》，《锡林郭勒盟文史资料》1983年第3辑。

两牧群长官虽已北投，但牧长、牧副、牧丁和大部分牲畜尚在。民国政府仓促应对危局，察哈尔都统任命绰克磊那木济勒署理牛羊群翼领，上都牧厂总管班札拉克察署理马驼群总管。8月班札拉克察赴达里冈爱召集各群官丁，但无论牧长、牧副、牧丁，竟无一应者。班札拉克察无法统辖，遂回到上都牧厂。[①] 库伦当局组织驼队南下运输，察哈尔都统何宗莲闻讯，严令达里冈爱牛羊群的上级——察哈尔牛羊群总管卓特巴扎普组建临时军队收复。卓特巴扎普领到500支枪、10万发子弹，在三旗牛羊群、上都马群和左右太仆寺旗中招募骑兵510人，与另一张姓统领的500人合兵，于9月25日到达前线，遭遇陶什陶属下部队200余人。双方枪战，卓特巴扎普初战告捷，获得战马、俘虏，陶什陶余兵乘夜越山遁逃。

在激进者心中，对达里冈爱的作战是收回故土，他们视卓特巴扎普为“侵犯自己的蒙古国”。[②] 因此库伦当局并未因失利而止步，其军事会议决定，任命由伊犁北投外蒙古的苏米雅贝子为达里冈爱守备大臣，率700名骑兵南下增援。卓特巴扎普军队是临时招募，有很大缺陷。时值秋天，漠北已经寒冷，他们没有冬衣行军不便。察哈尔都统许诺尽快运送服装枪弹，但苏米雅利用补给未到之时抢先发难，于10月初决战，张统领丢失阵地逃回张家口，卓特巴扎普受伤被俘，送至库伦“抽打八十鞭，投入狱中”。[③] 察哈尔都统仓皇间又将牛羊群左翼副总管依达木札普调任达里冈爱马驼群总管，希望“认真保护牧群，并妥为安抚随时侦查报告”。[④] 但新任总管已无法到达该处，只得退回察哈尔正黄旗遥领，成为虚职。

失利的消息传回内地，被新闻界道听放大，《时报》一传千余人被袭击，再传则变成万余人被围攻。[⑤] 恐惧氛围下，察哈尔方面不敢再行动，都统何宗莲向大总统袁世凯推卸责任：“该地距口一千五百里，鞭长莫及，兵力难以接济，束手无策。”[⑥] 袁世凯感觉事态严重，11月直接向库伦当局去电，质问哲布尊丹巴为何出兵达里冈爱等地，致使人民惨受兵祸。[⑦] 库伦当局不理睬北京的交涉，已将达里冈爱视为属地，胁迫当地富户年内赴库伦拜谒哲布尊丹巴，随后勒令他们返回达里冈爱“就地募兵五千名，以负抵制汉军之计”。[⑧] 牧厂马驼羊均为游牧作战的重要物资，库伦当局军队四处掳掠，拘捕不交牲畜之人。此番操作下，达里冈爱蒙民恐惧不已，四散躲避，或干脆举家北迁以求保全，使数百里内“四大皆空”，[⑨] 只有贫民留在原地。

舆论慨叹“此次失守于蒙事大有影响”，[⑩] 事实确实如此。库伦当局希望与内蒙古共建“大蒙古国”，达里冈爱成为他们南下的基地。1913年初，陶什陶网罗胡匪，聚集数千人赴达里冈爱，计划侵入边陲，使民国北部军力奔命不遑，而后行乘间捣虚之计。[⑪] 军队屯驻达里冈爱，南可下察哈尔、热河，东可侵东三省，西可进苏尼特，直指西部要地绥远。一时间内蒙古各地闻

---

① 《达里冈崖战事详报》,《新闻报》1912年11月2日。

② 桑普乐东日布口述，夏·占布拉扎布整理:《察哈尔盟盟长卓特巴扎普》，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委编:《内蒙古近现代总管录》，内蒙古政协文史书店，2001年，第27页。另外，此口述初战发生在阴历六月初，对照《达里冈崖战事详报》，桑普乐东日布回忆的时间有误。

③ 牡丹编译:《卓特巴扎普传略》,《锡林郭勒盟文史资料》1983年第3辑。

④ 《何宗莲呈大总统遴委依达木札普接署达里岗崖马驼群总管请鉴核》，1912年10月23日，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第1册，第166页。

⑤ 《时报》1912年12月24日、1913年1月17日。

⑥ 《达里冈爱失守警闻》,《新闻报》1912年10月28日。

⑦ 《复库伦哲布尊丹巴书》，1912年11月，骆宝善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1册，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5页。

⑧ 《库兵占据达里岗崖后之行动》,《时报》1913年3月10日。

⑨ 《达里岗崖之惨状》,《新闻报》1912年12月12日。

⑩ 《达里冈爱失守警闻》,《新闻报》1912年10月28日。

⑪ 《陶什陶将至达里冈爱》,《新闻报》1913年3月20日。

警，归绥地区甚为恐慌，山西都督阎锡山与绥远将军张绍曾紧急磋商对策，[①] 筹划封禁晋北、绥远，防止粮食北运资敌。随后，库伦当局由达里冈爱南下作战的军队，成为动荡内蒙古的主力，时称“丑年之乱”。

1913 年末，“丑年之乱”被民国政府化解，外蒙古南下力量基本退出内蒙古。11 月 5 日中俄两国达成协约，同意外蒙古自治的区域应以“前清驻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地区组成”。[②] 此项协约带来了理解分歧：民国北京政府认定达里冈爱属于察哈尔，不属于前清库伦办事大臣所管辖的车臣、土谢图两汗部；外蒙古库伦当局坚持此地为两汗献给康熙帝，改朝换代后应收归“蒙古国”，因此仍然占领。原达里冈爱牛羊群翼领索诺木多普丹北投后成为该地世袭扎萨克，但常住库伦不来牧厂。一年多时间里，库伦当局委派位于达里冈爱以东额尔德尼查干的游格吉庙喇嘛守备。他时常派兵检查，禁止官员南来，有意隔离民国。察哈尔都统何宗莲与达里冈爱扎木呼尔庙堪布私信，了解到该地人民被兵祸滋扰，盼望内向，力劝中央交涉该地。[③]

三、“中俄蒙谈判”围绕达里冈爱的争夺

1914 年 9 月 8 日“中俄蒙谈判”[④] 在恰克图召开，北京政府代表毕桂芳、陈箓，俄国政府代表密勒尔，以及库伦当局代表，就外蒙古问题开始谈判。10 月 23 日会议，俄国为降低民国在沿边地区的军事存在而提出：“允在达里冈崖、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各盟，以及与外蒙交界之哲里木盟各蒙旗，不殖民，不设治，不驻兵。”[⑤] 此议实际上从侧面证明达里冈爱应归北京政府。库伦当局代表立即反对，认为达里冈爱等地已情愿归附，理应划归“蒙古国”。但就俄国提案，北京政府摸清了俄国政府态度，即不积极支持库伦当局吞并达里冈爱。于是在谈判桌下，北京政府开始为收回达里冈爱做准备。

首要是调整管辖关系。北京政府已于 1914 年任命阿玉尔为达里冈爱马驼群总管，驻张家口遥领，负责察哈尔都统与达里冈爱的联系。依据《清室优待条件》，上都、达里冈爱马驼群仍属内务府所有。1914 年末，何宗莲以该群官兵全食民国俸饷已与清室无干为由，提出上都、达里冈爱“不应仍归上驷院管理”。[⑥]1915 年初，徐世昌批准两地马驼群划归陆军部，转交察哈尔都统管理，[⑦] 彻底撇清与逊清的关系。库伦当局任命的达里冈爱扎萨克索诺木多普丹刚刚在库伦去世，其子车博克扎普承袭扎萨克职位和郡王爵位，他随其父习惯也不来牧厂，只委托身在达里

① 《达里冈爱失守后防务》,《新闻报》1912 年 11 月 1 日。

② 《声明另件》,《中俄边界条约集（俄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 年，第 138 页。

③ 《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1914 月 10 月 20 日，察哈尔都统何宗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馆藏号：03-32-164-02-036。

④ 此时外蒙古地位仍属地方性质，不能将之与中俄并列，当时谈判将三者并称，本文对此加引号以示依照当时的会议称谓习惯。同样，文中“中俄蒙协约”“中俄蒙共同划界”也加引号，以示三者并非并列关系，仅为依照当时的会议称谓习惯。

⑤ 《中俄蒙三方恰克图会议录》，吕一燃编:《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61 页。

⑥ 《留任察哈尔都统何宗莲呈察属商都牧群应行设法整顿划清管理权限据该总管条陈办法缮折转陈请核示并批令》，1914 年 12 月 31 日,《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第 2 册，第 220 页。

⑦ 徐世昌:《内务、陆军部呈会核察属商都达哩岗崖牧群拟请归都统管辖并将整顿办法妥筹报部核办文并批令》,《政府公报》第 49 册，1915 年 2 月 9 日第 990 号。

冈爱的近族亲属车林帕拉木代为管理。① 在阿玉尔的沟通下，车林帕拉木有意获得北京政府的封赏，委托下属翼长于 1914 年 12 月 18 日来到张家口。察哈尔都统何宗莲当即传见，面询该群牧务，各奖给衣料等物以示优待，令翼长等人深感“国家之仁化”。就此，察哈尔恢复与达里冈爱的联系。

但上述措施仅只联络，能支配达里冈爱物产才算真正意义上的管理。何宗莲接待众人时提出：“国家现在需用战马，汝等能否调取？”② 翼长当即答应，何宗莲即命他调取骟马五百匹，形势向有利于民国的方向发展。但实际上，车林帕拉木只是两边讨好，并不敢得罪库伦当局。与此同时，他也接受车博克扎普的命令，向达里冈爱勒要马千匹解送库伦。③ 为民国政府取马的官员正巧被车博克扎普亲信抓获，车博克扎普意识到达里冈爱有南归势头，于是在 1915 年 1 月 9 日率兵堵截，将何宗莲调取的马匹抢去转送库伦。④

抢马事件证明北京仍然无法控制达里冈爱，良好形势戛然而止。身在恰克图谈判一线的毕桂芳、陈箓感叹道：

> 今库伦任意撤放达里岗崖总管，微特干我内政，实欲先发制人，以为会议时预占地步。⑤

库伦当局欲造成管辖事实，为在“中俄蒙谈判”中主张达里冈爱增添筹码，于是谈判桌上的争锋转向激烈。2 月 16 日始，谈判进入核心问题——划定外蒙古自治范围，北京政府代表提出根据官书《蒙古游牧记》记载“外蒙之界线……南面应以达里冈爱及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两盟为限”，而外蒙古“车臣汗部所属二十三旗、图什业图汗部所属二十旗中，向未有达里冈爱旗名”，它归察哈尔都统管辖，非库伦办事大臣所属。根据 1913 年中俄《声明另件》，达里冈爱应归内蒙古，库伦当局自 1912 年“强逼该牧厂总管出境，另派有扎萨克”均为非法，须将管理权交还。同时，北京政府代表进一步提出归属权类似的漠北台站问题：“自内蒙乌兰察布盟边外起点，北至赛尔乌苏，再由塞尔乌苏西至哈达图，所有各台站，向系察哈尔都统所属，非库伦办事大臣管辖，故应仍归察哈尔都统管理。”台站干道直入外蒙古腹地，为库伦当局所必守，北京政府代表抛出此问题，意为掌握谈判筹码。

库伦当局代表对上述两地坚不认可，强调达里冈爱在地理上三面与外蒙古相接，且最早由车臣、土谢图两汗部划出，自辛亥革命后“复归外蒙自治官府管理，并派出扎萨克带有印信”，更坚持漠北台站“系自治外蒙属地无疑”，两地均应划归外蒙古。果然如毕桂芳所料，库伦当局代表以实际管辖为凭争夺达里冈爱，他们开出的划界方案南界包含“所有达里冈爱苏鲁克等地方”，直接与锡林郭勒盟各旗相接。交锋之下，北京政府代表在漠北台站归属上退让，“允不要求该段台站”以换回达里冈爱，因为它“并非一旗，乃系特别区域”，库伦当局私相任命此地扎萨克并不合理，随后开列达里冈爱四至：

> 南与阿巴噶、阿巴哈那尔、东西苏尼特等旗北边接界；北与车臣汗部扎萨克多尔济扎布左翼后旗、扎萨克洛布桑吹都布瓦哈旺帕勒齐达什车林中末右翼旗接界；东与车臣汗部扎萨克都

① 《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1915 年 1 月 11 日，统率办事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馆藏号：03-32-165-02-011。

② 以上详见《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1915 年 2 月，大总统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馆藏号：03-32-141-01-024。

③ 《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1915 年 1 月 11 日，统率办事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馆藏号：03-32-165-02-011。

④ 《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1915 年 2 月，外交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馆藏号：03-32-141-01-025。

⑤ 《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1915 年 1 月 15 日，外交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馆藏号：03-32-166-02-079。

特德右翼旗接界；西与土谢图汗部默尔根王左翼中旗接界。

较之光绪《蒙古志》更细致，强调它“官有牧厂”的性质，“二百余年，未尝更变”。而核对外蒙古历来旗册官图，皆无此地。

库伦当局代表在旗册官图方面无法反驳，只得抛开法理上的管辖权，转而提出“察哈尔都统只管辖派往达里冈爱牧养牲畜之察哈尔蒙民，并非该地方之土地”，即将管理权与人地关系割裂，希图将谈判引向两汗部故地历史的属地问题。俄国政府代表撕开中立假面，又在属人问题上推波助澜：“现在达里冈爱既无皇家牧群，且牧养牲畜之察哈尔蒙民已去，现在该处之居民皆系外蒙人，故该地方之土地当然仍划归外蒙。”

首先，俄国政府代表的发言混淆民国与清朝的承接关系，认为库伦当局有权接收前清皇室遗产，这与《清帝退位诏书》相悖，在法理上站不住脚；其次，此发言强调在达里冈爱生活的外蒙古居民，刻意回避在此生活的内蒙古居民，以及他们的交融。

对此，北京政府代表立即驳斥俄方故意偏离谈判主线——核心问题不是达里冈爱曾经属于何人，而是在法理上归何人管辖。针对属地问题，即使它在康熙朝之前属于外蒙古，也不能改变现在隶属于察哈尔的事实；针对属人问题，“中国向未有地方与居住该地方之人民归两官吏管辖之办法”。在北京政府代表坚持下，俄国政府代表“承认达里冈爱确系曾归察哈尔都统管辖之事实”。北京政府代表要求将以上声明编入会议记录内，而在协约内只概括为“自治外蒙南边与内蒙古接界”，默认达里冈爱归察哈尔，不单独论述，避免特殊化。但作为交换，漠北台站均归入库伦。[①] 至此，北京政府在谈判桌上收回达里冈爱。

1915 年 6 月“中俄蒙协约”签字，确定民国对外蒙古拥有主权，外蒙古获得自治权，库伦当局回归为库伦地方政府的性质。但实际上，达里冈爱仍被库伦地方政府控制，北京委任的总管阿玉尔有名无实。外交部意识到，唯有“乘机设法将该牧群总管由我自派”,[②] 才可真正收回达里冈爱。

暂时的尘埃落定使北京政府对外蒙古重建关系，之前各战役中的俘虏陆续获释，其中卓特巴扎普的回归最为关键。他在 1912 年收复达里冈爱战斗中失败被俘，一直囚禁在库伦。1915 年春“中俄蒙谈判”接近尾声时，外蒙古属性争端即将尘埃落定，库伦当局将他放回，袁世凯立即接见并抚慰，令他重新上任察哈尔牛羊群总管。达里冈爱各牧长多为卓特巴扎普的察哈尔旧部，他回到察哈尔，对控制达里冈爱是无形的力量。

口外马驼群、牛羊群分属内务府的上驷院、庆丰司，不利于民国政府统一管理。马驼群刚刚与前清内务府脱离，划归陆军部。卓特巴扎普调查了几年以来牛羊群的损失，提出整顿方案，建议将牛羊群也脱离内务府“改组为马群，以备国用”,[③] 由此组建直属陆军部的明安牧场，仍由察哈尔在地管辖，为国家提供军需而不为逊清皇室服务。此方案利于察哈尔统一管理马政，其中当然包含达里冈爱。

与此同时，库伦地方政府并不甘心协议裁定，其“内务部”在达里冈爱广贴告示，以收回漠北台站为例，宣称：

---

① 以上各引文和具体内容详见《中俄蒙三方恰克图会议录（1914 年 9 月—1915 年 3 月）》，吕一燃编：《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第 118–133 页。

② 《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1915 年 4 月，外交部政务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馆藏号：03–32–135–01–034。

③ 《留任署察哈尔都统何宗莲呈拟将牛羊群改组为明安马群拟具章程请训示文并批令》，1915 年 6 月 16 日，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第 2 册，第 436 页。

> 达里岗崖旗亦在喀拉喀游牧范围之内，将来三方面派员划分界址时，定必归入蒙古国界内，所有该群官员人等务各照旧安居，勿庸惊惶。[①]

坚持主张继续管辖，寄希望于会议约定的两年后"中俄蒙共同划界"，这令被裹挟其间的达里冈爱官民无所适从，北京此时的态度和做法便成为关键。

四、1915 年正式收复至 1921 年第二次被占

针对达里冈爱若即若离的状态，卓特巴扎普推出旧人，让清末被降职的前达里冈爱马驼群总管布彦德勒格尔担任宣慰官，收复旧部。布彦德勒格尔曾在达里冈爱任左翼驼群翼长 17 年、马驼群总管 7 年，此时已 61 岁，与当地关系深厚。1915 年夏，布彦德勒格尔在察哈尔都统支持下，携带宣慰文书赴达里冈爱宣布德意，询问疾苦，并顺便详查该群人口、牲畜、地方情形。这是自 1912 年达里冈爱第一次外附后，民国首次遣官进入该地。达里冈爱众官已心向察哈尔，难题是如何打动之前由库伦当局册封的扎萨克郡王车博克扎普。

布彦德勒格尔此行收获重大，不仅成功联络到旧部，更直接与车博克扎普商谈优待条件。车博克扎普权衡之下，决定接受北京招抚，于 8 月 22 日带领"各翼长等赴口晋谒"。[②] 他到张家口后，献战马 200 匹交陆军部作为投诚表示。北京政府立即做出回应，首先，在官僚程序上实现任命自主：9 月 8 日外交部提出"达哩岗崖既为我属，则加封、发印似无窒碍"，[③] 由政事堂令印铸局铸发印信、关防、图记；9 月 9 日袁世凯册封车博克扎普为世袭毕什呼勒图多罗郡王，给予二等嘉禾章，并担任总管原职。同时，各翼长也封爵授勋章并放为原职。这意味着北京政府在爵位上维持其旧有地位，但在职务上特别强调原职是总管，否定之前由库伦当局改换的世袭扎萨克制，仍将之纳入流官系统，这个日期标志着北京政府完全收复达里冈爱。布彦德勒格尔因招抚功勋卓著，授世袭四等台吉，给予四等嘉禾章，[④] 稍后又给予卓特巴扎普四等文虎章。其次，为进一步明确归附，袁世凯决定在北京接见投诚人员。10 月 23 日，车博克扎普表示"倾心向化，率众投诚，深蒙大总统鸿施优奖，并准觐见"，[⑤] 进京向袁世凯进献哈达二方、马二匹、蘑菇二匣、黄油二桶，以蒙古特有方式表达正式归附的意涵。

但袁世凯不止于奖励投诚，更要去除库伦地方政府对达里冈爱的影响。车博克扎普申请于 11 月初返回，[⑥] 正当蒙藏院为他申领特别川资时，袁世凯突然下令：

> 毕什呼勒图多罗郡王车博克扎普著开去总管原职，留京当差。[⑦]

不放他回达里冈爱，意为切断库伦地方政府与达里冈爱的关系，恢复民国秩序，与此同时任命布彦德勒格尔为达里冈爱总管。布彦德勒格尔着手统计牧户历年受灾情况，以轻重分为三等，

---

① 《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1915 年 8 月，大总统袁世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馆藏号：03-32-166-02-105。

② 《留任署察哈尔都统何宗莲呈派员赴达哩岗崖地方牧群宣慰请鉴核文并批令》，1915 年 8 月 14 日，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第 2 册，第 494 页。

③ 《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1915 年 9 月，外交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馆藏号：03-32-166-02-108。

④ 《大总统策令》，1915 年 9 月 12 日，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第 2 册，第 526 页。

⑤ 《蒙藏院呈代陈达哩岗崖牧群总管兼毕什呼勒图多罗郡王车博克扎普贶品乞鉴文批令》，1915 年 10 月 23 日，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第 2 册，第 577 页。

⑥ 《蒙藏院呈为达哩岗崖总管郡王车博克扎普定期回牧可否援照特别川资条例给予川资请训示文并批令》，1915 年 10 月 30 日，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第 2 册，第 583 页。

⑦ 《大总统策令》，1915 年 11 月 4 日，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第 2 册，第 585 页。

核对造册上报。11 月下旬，新任察哈尔都统张怀芝报告，达里冈爱归附三个月来已倾心内向，建议民国自此时起“照常发给俸饷”。[①]1916 年 1 月，北京政府委派第一师第一旅旅长李焕章为放赈官，携款二万元安抚兵灾以来的流离困苦。1 月 15 日，李焕章到达达里冈爱，按灾户发放赈款，“必躬亲监视，询问明确，并宣布大元帅轸念蒙灾、优予抚恤之德意。该蒙众、官兵等莫不欢欣鼓舞，感谢天恩……内向之心弥坚”，[②] 同时他们观察到沿途各地均已安宁。

1916 年春，陆军部直辖的明安牧厂正式组建，由卓特巴扎普任总管，达里冈爱牛羊全部折算成骟马改建马场，兵丁的薪水、枪支弹药都由陆军部供给，并商定陆军部每年检验马群一次。[③] 一系列操作下来，达里冈爱完成从内务府体系向陆军部体系的转变，进入了“民国时间”。

北京政府接收完成，已无必要将车博克扎普滞留在京，1916 年 4 月 5 日他申请回旗省亲得到批准，北京政府又授其子为头等台吉，以便将来袭爵。[④] 此后车博克扎普回到库伦，并于次年 5 月续假，不再来京，但也不在达里冈爱任职。民国此后对达里冈爱的管理举措主要有四：

1. 召回逃人：之前连年兵祸，达里冈爱多有人民携牲畜财产逃往车臣汗部避难，造成达里冈爱的牧丁、牲畜急剧减少。新任总管布彦德勒格尔函商，将这些人“迅速逐令回籍”。[⑤] 库伦地方政府并不配合召逃，布彦德勒格尔一面组队招抚，一面委托驻库伦办事官员交涉，将避难人员及牲畜“从速饬回，以便点验、烙印（指牲畜）”。[⑥]

2. 划定界线：清朝拥有内外蒙古全部地域，达里冈爱在内或在外都不是问题，因此在清末地图中，达里冈爱均画在外蒙古，也未画成单独区域，这个画法延续至民初地图。1914 年“中俄蒙谈判”之初何宗莲已提醒“对与达里岗崖与外蒙交界地方格外注意，勿使稍有侵占”，[⑦] 参谋本部的一百万分之一《内外蒙古交界图》随即发生了变化，达里冈爱成为一个单独区域，凸出于内、外蒙古之间。[⑧]1915 年 6 月 7 日“中俄蒙协约”达成，规定在两年以内对外蒙古自治区域的划界。[⑨] 国务院极其重视，1917 年 5 月叮嘱防范库伦地方政府将该牧场地方吞入外蒙界内，亟应预搜案据以为将来交涉辩驳。[⑩] 秉持此原则，参谋本部于该年选派测量员 50 名、护兵 500 名组建“考察蒙古地形队”，秘密赴此地测绘二十万分之一比例交界图。[⑪]1919 年全线测绘完成，民国地图逐渐发生变化：以权威的商务印书馆地图为例：1917 年版《中国新舆图》仍延续清末 1905 年版《大清帝国全图》的画法，将达里冈爱归入外蒙古，勘界完成后的 1919 年版《中国形

---

① 《大总统批令》，1915 年 11 月 21 日，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第 2 册，第 603 页。

② 《察哈尔都统张怀芝恭报派员赴达哩岗崖牧群散放赈款情形祈鉴折》,1916 年 3 月 7 日，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第 3 册，第 84 页。

③ 桑普乐东日布口述，夏·占布拉扎布整理：《察哈尔盟盟长卓特巴扎普》，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内蒙古近现代总管录》，第 32 页。

④ 《政事堂奉批令》，1916 年 4 月 5 日，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第 3 册，第 103 页。

⑤ 《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1916 年 12 月，察哈尔都统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馆藏号：03–32–141–01–061。

⑥ 《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1916 月 11 日，外交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馆藏号：03–32–141–01–059。

⑦ 《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1914 年 10 月 20 日，察哈尔都统何宗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馆藏号：03–32–164–02–036。

⑧ 参谋本部制图局模绘：《内外蒙古交界图》（一百万分之一比例），1915 年 6 月。

⑨ 详见《中俄蒙协约》，《中俄边界条约集》（俄文汉译本），第 140 页。

⑩ 《收国务院函》，1917 年 5 月 18 日，李毓澍编：《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中华民国六年至八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5 年，第 33 页。

⑪ 《收参谋本部咨》，1916 年 1 月 4 日，李毓澍编：《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中华民国六年至八年》，第 2 页。

势一览图》已将达里冈爱画入察哈尔范围内，即管辖意义上的内蒙古地区，只是形状较为扁平，尚欠规范。[①] 之后民国各地图出版机构又依据测绘数据不断修缮，如屠思聪在上海创立的世界舆地学社，对民众普及地理知识影响较大，其 1926 年版《中华新形势一览图》中的达里冈爱地区已较 1919 年商务印书馆地图明显向北凸起。[②] 在 1932 年《申报》创立 60 周年之际，东北地区已被日本占领，经理史量才决定编纂新地图以期盼“金瓯无恙”。此套地图定名为《中华民国新地图》，由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主持绘制，结合参谋本部测绘二十万分之一比例地图成果，出版于 1934 年，由于质量高，立即成为民国地图标准。其中达里冈爱画在察哈尔辖区，但伸入漠北，更符合勘测的形状，[③] 这种样貌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仍在沿用[④]，并为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所采用。

3. 国民学校：民国推行现代学校教育，针对边地蒙汉杂处的状况，察哈尔组建“察哈尔汉蒙教育事务所”，统筹教育汉蒙儿童，留意其身心发达、培养其国民道德，并授以生活知识技能。1917 年 2 月 15 日，所长吴德镇草拟《达哩冈崖国民学校应准备案》获批，该案规划学校规则二十五条、经费数目等项目，经费由察哈尔财政分厅在“各县应解四厘另租项下开支”，校舍与教学设备由布彦德勒格尔负责，学生用书、笔墨纸张均由公家购置。校规注重汉蒙平衡，校领导需有汉蒙语言能力，夫役也是汉蒙各一，饮食方面特别强调按蒙人习惯预备。开设课程第一年为汉文、汉语、习字，第二年起加修身、读经、算数、体操，仅因师资暂缺唱歌、手工，另规定双十国庆放假两日，[⑤] 达里冈爱实行了教育部在全国的统一规定。

4. 收取马匹：能够每年正常收取国家需要的马匹，是成功管理达里冈爱的标志。察哈尔都统规定该处应备官马 1 万匹，并令每年缴马 1 千匹作为其他牧厂种马。[⑥] 经过一系列安抚工作，牧厂在 1919、1920 年各交军马 1500 匹，价值 10 余万元，意为北京政府对此地管理已进入常规轨道。

经过以上措施，达里冈爱各项管理制度化、正常化。1919 年外蒙古暂时取消自治时，达里冈爱已经不再成为讨论的问题。1921 年陆军部再次组织勘测达里冈爱各牧厂，并查验马驼各情形，5 月 1 日，政府奖励牧厂负责人布彦德勒格尔、测量委员梁炽昌、朱进，[⑦] 这是档案所见民国官方对达里冈爱最后的管理，之后形势再次发生巨变。

俄国革命造成红白之战，白军向东败退。1921 年 2 月白军头目恩琴占领库伦，哲布尊丹巴集团恢复“自治”，形势急转直下。3 月初，红军支持的外蒙古人民党在恰克图成立，并编组、训练军队，经过战斗逐步取得优势，于 7 月初进入库伦，其后“蒙古人民政府”成立，其后《俄蒙修好条约》在莫斯科签订，苏俄与外蒙古互相承认主权。

这一系列动荡，使达里冈爱再次依附外蒙古，该地牧户被迫北迁。北京政府令卓特巴扎普再次组织军队收复达里冈爱。卓特巴扎普从察哈尔左翼四旗、四牧群征兵 500 名，在察哈尔都

---

① 《大清帝国全图·内外蒙古》，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一年刊本；《中国新舆图·外蒙古、绥远特别区域、察哈尔特别区域、阿尔泰区域》，商务印书馆，1917 年；《中国形势一览图·热河、绥远、察哈尔合图》，商务印书馆，1919 年。

② 屠思聪：《中华新形势一览图·绥远、热河、察哈尔图》，上海世界舆地学社，1926 年。

③ 丁文江等编：《中华民国新地图·政治区域图》，上海申报馆，1934 年。

④ 地图联合出版社编：《蒙古人民共和国地图》，地图联合出版社，1952 年。

⑤ 《咨察哈尔都统达哩冈崖国民学校应准备案文》，《教育公报》1917 年第 4 卷第 5 期。

⑥ 察哈尔都统署编：《察哈尔政务辑要》，内蒙古高校人文社科中国北疆史重点研究基地等编：《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之十二上册，远方出版社，2012 年，第 389 页。

⑦ 以上详见《呈大总统核拟勘测各牧场并查验达里岗崖牧场在事异常出力人员朱进等请分别补官给章缮单呈鉴文》，1921 年 5 月 1 日，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第 4 册，第 344 页。

统处领取 500 支步枪，10 万发子弹，以及后勤装备。全军在羊群庙（哈登胡硕庙）编为四营，于七月初向北出发。其后与外蒙古军队交战数次，最终未收复，只赶回 3800 匹马上交陆军部，在察哈尔新建三个马群。到冬季，达里冈爱逃来 40 多户牧民，卓特巴扎普把他们安置在明安牧场的察干淖尔一带，直至 1945 年苏蒙联军为消灭蒙疆日军进入内蒙古时，又将这些牧户迁回达里冈爱。[①]

随着北京政府在外蒙古溃败，以及内地的军阀混战，民国再也无力收复达里冈爱。外蒙古重新接管达里冈爱后，将此地编为十二个佐领，负责为其提供粮马。[②] 民国官方始终未承认达里冈爱外附，1928 年始国民政府进行牧场改革，将原上驷院所属归入察哈尔省立第一模范牧场序列，庆丰司所属归入察哈尔省立第二模范牧场序列。[③] 第二牧场场长呢玛鄂特索尔代理管理达里冈爱，但 1931 年赴牧场调查的日本人江上波夫见证："实际上现在达哩岗崖牧场在外蒙古境内，所以他这个牛羊总管不过是有名无实的官名而已。"[④]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开发边疆的热议，有识之士曾隔空指画，提议将达里冈爱改牧为耕：

> 荒地概数：约三六大亩，地二十八万六千五百三十三顷；所有权：此为军马场；土质：该地虽在内蒙极北鄙，已与外蒙接壤，然土质较锡盟尚优，故宜改牧为垦。[⑤]

但计划显然无法实现，1936 年察哈尔地方志已承认该地"已被外蒙侵占"，[⑥] 因为早在 1931 年外蒙古建立巴彦图门省，已将达里冈爱作为一个县（达里甘嘎县）纳入，之后它在 1941 年又划入新建的扎布哈朗特希尔嘎省，该省两年后改名苏赫巴托尔。

五、结语

达里冈爱之失是一桩历史谜案，不清楚它的外附过程，中国北部边疆沿革拼图无法完成。清朝对口外牧厂的管理模式、逊清内务府对遗产的焦虑，是达里冈爱事件的起因。牛马驼群总管、羊群翼领在 1912 年 8 月北逃并献上户口、地形等图册，随后库伦当局任命扎萨克管理，标志着达里冈爱第一次外附。随后卓特巴扎普收复失败，直到 1915 年"中俄蒙协约"达成，北京政府以漠北台站所有权换回达里冈爱后，才有能力采取一系列措施。以 1915 年 9 月 9 日车博克扎普进京被封为标志，北京政府收复并实际管辖达里冈爱，具有主动作为。1921 年外蒙古局势变化，以卓特巴扎普军队退回为标志，民国再次失去达里冈爱。

梳理争夺脉络，首先需要回答：北京政府为何能在 1915 年成功收复达里冈爱？民国元年未能迅速恢复秩序，但察哈尔地方政府最早意识到得不偿失，何宗莲急报：

> 查达里岗崖现有牲畜所值之数，较俸饷倍蓰。因涓滴之款，而弃多数之产，并致燎原之祸，

---

① 以上详见桑普乐东日布口述，夏・占布拉扎布整理：《察哈尔盟盟长卓特巴扎普》，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内蒙古近现代总管录》，第 36–37 页；牡丹编译：《卓特巴扎普传略》，《锡林郭勒文史资料》1983 年第 3 辑。另据方志记载，卓特巴扎普于 1919 年"率骑兵 1000 人，第二次出兵收复达里岗崖获胜，赶回蒙古马 3800 余匹"，显然年份有误。参见《锡林郭勒盟志》编纂委员会编：《锡林郭勒盟志》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47 页。

② 《外蒙政府现饬达里冈爱十二佐领各备粮马及虐待华商案已据情等》，蒙藏委员会：《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1931 年第 8 期。

③ 宋哲元监修：《察哈尔通志》，文海出版社，1966 年，第 2427–2428 页。

④ 江上波夫等：《蒙古高原行纪》，赵令志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27 页。

⑤ 李延墀、杨宝编辑：《察哈尔经济调查录》，内蒙古高校人文社科中国北疆史重点研究基地等编：《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之十八上册《表二：省内盟旗可耕荒地概况表》，远方出版社，2015 年，第 64 页。

⑥ 纪霭士：《察哈尔与绥远》，内蒙古高校人文社科中国北疆史重点研究基地等编：《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之二十二，远方出版社，2017 年，第 329 页。

智者不为。[1]

从经济角度示警，提醒中央切莫疏漏。民国收复的基础来自清朝的管辖依据——达里冈爱“与待遇外蒙设官节制之性质，迥不相同”,[2] 内可循例管理，外可据理力争。北京政府的成功在于未将希望全部寄托于谈判桌上，“中俄蒙谈判”期间北京政府代表提醒外交部协约只是空文，重要的是防止库伦地方政府继续其实际管辖。因此协议达成后北京并未止步于谈判桌上的条文，而是主动采取册封和颁发关防印信、图记的做法，从法理、程序、实际三方面取得管辖权，并看重划界与地图的效力。由此，民国全面管理达里冈爱的政治、经济、教育。应该说，北京政府虽然受制于列强，延续着晚清以来的缺陷，但它在摸清俄国态度后，进行了积极的收复，可算退让中的作为。

其次需要回答：为何会再度失去？地理上，达里冈爱在锡林郭勒盟迤北越瀚海戈壁，与外蒙古三面相接。因此达里冈爱牧户经历兵祸、灾害时，更易向外逃难，甚至就此定居于外蒙古，这就增加了北京政府的控制难度。北京政府希望通过勘界表达管辖权力，但因惧怕俄国干涉，仅仅以“蒙古地形考察”的名义秘密测绘，更不敢在达里冈爱边界设立界碑，勘界成果在当地不醒目、不直接。外蒙古库伦地方政府执念于此地，一方面坚持达里冈爱在康熙朝之前曾属喀尔喀，不承认《清帝退位诏书》对清皇遗产的处置；另一方面又坚持“该五翼人员前既服从我外蒙，领受爵职印信，隶属本官府管辖”,[3] 认定短暂管辖具有长期效力。究其原因，游牧社会以牧业孳生为本，因此视水草丰美的达里冈爱牧厂为要地。为增强军力，库伦当局曾在达里冈爱募兵五千，与此同时在喀尔喀四部各征兵一万，[4] 也就是说在库伦当局眼中，达里冈爱的资源可抵半个盟部。以上诸多因素均使库伦当局执着于此地，一旦变乱打破平衡，达里冈爱的归属也就再度发生了变化。

References

Chen Xiaohan.*Qichongzou: qingchao tongzhi zhili kouwai zhi yishu* (The septette: the art of governing ethnic groups beyond the Great Wall in the Qing Dynasty).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2023.

Hasbagana. “Qingdai kouwai wanggong muchang tanze” (Exploration on the pastoral land of nobility in the Qing Dynasty). *Zhongyang minzu daxue xuebao*(Journal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50.2(2023).

Li Yushu.*Mengshi luncong* (Essays on Mongolian history).Taibei：Liren shuju, 1990.

Sodbilig. “Qingdai chahaer guanmuqun kaoshu:yi shangdu dabuxunnuoer muchang wei zhongxin(Research on the official herds in Chahar in the Qing Dynasty: focus on shand—dabusun—nuur herds).*Neimenggu shehui kexue*(Inner Mongolia Social Sciences)43.5(2022).

Zhou Xuejun. “Daligangai muchang bei waimenggu zhanling shijian kaobian” (A study of the year in which Dariganga was annexed to Outer Mongolia),*Zhongguo bianjiang shidi yanjiu* (China’s

① 《署察哈尔都统何宗莲呈大总统请迅饬财政部发达里岗崖马群羊群俸饷文并批》，1912 年 10 月 8 日，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第 1 册，第 152 页。

② 《收国务院函》，1917 年 5 月 18 日，李毓澍编：《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中华民国六年至八年》，第 33 页。

③ 《北洋政府外交部全宗》，1916 年 12 月，察哈尔都统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馆藏号：03−32−141−01−061。

④ 胡太才：《侦蒙记》，忒莫勒等主编：《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北部边疆卷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 69 页。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10.4(2000)

Research on the Territorial Attribution of the Dariganga Region

ZHANG Linxi（Compilation & Research Center of the Qing History under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China，Committee for the Compilation of Qing History; zhanglinxi@pku.edu.cn）

Abstract: The Dariganga region was gifted to Emperor Kangxi by the Khalkha Mongols. In 1700, it was established as the largest imperial pastureland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jointly managed by the Chahar Commonder-in-chief. However, its location in the Gobi Desert made it difficult to control. In 1912,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demanded sheep tribute and did not pay annual salaries, forcing local officials to flee north to the Khalkha authorities in Kulun in August. When the Republica of China's Chahar Commonder-in-chief failed to reclaim the region through force, the Khalkha authorities took control, transforming the governance system from Supervisor-in-chief to hereditary Zasak to secure strategic resources.During the 1915 “Sino-Russian-Mongolian” negotiations, the Khalkha authorities based their claim on de facto control, while the Beiyang government countered with principles of territorial and demographic sovereignty, ultimately regaining Dariganga by trading ownership of the Khalkha’s postal relay stations. In September, Yuan Shikai summoned the local Zasak to Beijing for an official title but detained him, reinstating the Supervisor-in-chief system in November. The Beiyang government later provided disaster relief, established public schools, and incorporated the region into Chahar. In 1921, when Outer Mongolia again broke away, Dariganga followed suit, reverting to its pre-Kangxi period status and ultimately becoming the third-largest territory lost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words: the Revolution of 1911,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the Outer Mongolia, the Beiyang Government, governance in frontiers